

文学教育的当代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卫小辉

(陕西师范大学 民族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通过追溯20世纪文学教育演变过程中的相关事件和现象,运用叙事分析方法,探究它们可能给予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旨在探索当代文学教育的出路。分析认为,当代文学教育只有回归语言本体,清除近代以来汉语变迁过程中造成的语言污染,承担起守护母语和语言本源性意义的责任,恢复现代汉语作为命名语言的尊严,才能建构起文学教育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文学教育;现代汉语;当代性;语言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1-0095-04

文学教育正在面临危机,这种危机集中表现在:一是文学教育从业者普遍滋生的职业焦虑,我们不得不叩问自己的职业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文学教育本身的体制如何适应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浓厚的实用主义氛围。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克服文学教育危机的可能性和出路,但是侧重点往往在于学科重建,而忽略了文学教育危机形成的深层历史原因,忽略了语言在文学教育中的奠基性地位。本文选取20世纪文学教育演变过程的几个历史场景进行阐释,期望能够揭示文学教育危机形成的深层历史原因,同时探询对于解决当代文学教育危机可能提供的启示。

一、关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科入学考试命题的争论

(一) 争论的背景及其缘起

1928年6月,随着北伐的完成,新疆通电归顺以及东三省的即将“改旗易帜”,国民党建立了形式上的统一政权。同年10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训政宣言》,宣布进入孙中山制订的“三步走”建国方略的第二步,即“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训政

伊始,国民党除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加强中央集权之外,同时以三民主义作为政权形态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此后的一段时间,仅仅从文学界看,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中无产阶级和三民主义2个修饰词的相互抵抗,1930年的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之争……在文化领域的所有较量中无一例外的败北,促使国民党对文化争议始终保持了高度敏感。当然,国民党的失败可能夹杂了更复杂的历史因素。1928年前后,新文化的重心已经南移到上海,但上海并没有取代北平成为高等教育的中心。与此同时,日本出于对中国的政治野心,以北平为核心筹备“东方文化事业”旗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大量启用旧派学者。在这些因素不断介入的情况下,特别是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变事的相继爆发,文化争论一旦涉及到新旧、南北之争,都会变得特别复杂。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时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委托陈寅恪为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科命题。陈寅恪所命入学考试题有以“孙行者”等为题要求考生对对子和“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等题目,这些题目在考试结束

收稿日期:2010-12-26

作者简介:卫小辉(1963-),男,陕西西安人,副教授。

后很快就引起争议。争议由部分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引发,他们以为此类题目是故意刁难学生,要求命题人能给出标准答案,同时要求校方退还报名费。这些本来属于事务性的纠纷,但以此为开端,争论的问题不断延展,因此,陈寅恪不得不放弃自己本来“不论政、不谈学”的信念,决定对因自己命题而引起的议论进行辩驳。

(二) 争论的核心及其意义

在这场争论中,对陈寅恪命题行为最强烈的指责来自陈旭旦,陈旭旦把这次命题及其相关行为称之为“国学之蠹”,以为与国家养士之旨相违背。不管陈旭旦出于何种目的,这种指责已经超出命题事件本身,从而演变成质疑文学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面对指责,陈寅恪的辩驳主要体现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致傅斯年》、《对对子的意义——陈寅恪教授发表谈话》等书信和访谈录中。而对于命题者来说,要回应这种指责,也绝不能局限于对命题动机的简单说明。因此,陈寅恪首先从3个方面对自己命题的动机和意义进行阐释——汉语文法的建立必须通过对藏缅语系的比较语言学研究才有可能实现,但这种研究暂时还不可能;对对子是汉语文法尚未成立之前既形式简单又涵义丰富,而且与华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的测验方法,可以借此知晓标志学生国文程度的各种要素,如声韵、平仄、语辞、单字词藏贫富等;作文题主要考验学生之想象力和描写能力。然后,陈寅恪就集中精力为文学教育本身辩护。

如果仔细思考陈寅恪的言路,陈寅恪为文学教育本身的辩护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是提出了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走向和文学教育本身密切相关的3个根基性的问题。问题可以用胡适所标举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个口号表述。第一,什么是建设“文学的国语”(即现代汉语文学系统)的基础?这个基础也许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汉语能够表达的思想及与其相适应的文法系统,但是这不能借助引入欧西语法系统来完成,只能从藏缅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出发才可以最后完成。第二,为什么要建立“文学的国语”?从五四的白话文到后来的大众语,种种现代汉语建设的努力往往都要确立一个语文学之外的价值基础,如个性解放等,这必然导致汉语能够表达的思想及与其相适应的文法系统之间的割裂。因此,在谈到《马氏文通》的影响时,陈寅恪强调,必须摧陷廓清马眉叔之谬种流传^[1]。从陈寅恪的思想看,消除这种割裂只能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出发,最终如宋代新儒家那样实现

思想史的整合。第三,建设“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必须落实到文学教育本身的目标。这个所谓目标就是文学教育可能给个体、给受教育者提供什么东西,恐怕只能如陈寅恪所强调的那样,通过文学教育最终培养出个体的想象力和描写力。

(三) 争论与文学教育危机

1932年的这场争论已经被遗忘,我们只能在学术史和某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看到它留下的一些印记,其中与文学教育本身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也许可以说,由于民族危机以及其他更紧迫的政治问题,这场争论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这一事件的确可以看作一个起点,它意味着文学教育的独立性受到意识形态的威胁。此后,由于历史的风云际会,文学教育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历史情境,而且必须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做出简单划一的选择。可以说,在这场争论之后,文学教育的危机始终潜伏着,而且处于持续恶化的状况之中。

二、在语言的轻与重之间

(一) 意识形态文体的形成

自从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文学就逐步笼罩在意识形态语体的影响之下。在这种语体逐步扩张而形成规范文体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个人的巨大影响,学术界接受李陀的命名,将这种语体称之为“毛文体”^[2]。1949年以后,毛文体更进一步借助国家制度的力量全面而持久地介入到文学教育内部,彻底改变了现代汉语的语言品质和语言主体的语言感受。

1965年6月1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明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每当我乘着车子经过北海大桥的时候,看到那碧绿的中南海,和那中南海中点点的灯光,虽是一刹那间,却叫我深思许久……在全国,到处都能够看到灯火,然而最亮的一颗在北京,在首都的中南海。他是世界繁星中最明亮的一颗,是满园鲜花中最美丽的一朵。……”文章结尾写到:“中南海中的明灯啊,你永远是深山中的向导,永远是海洋中的灯塔,永远是滋育万物的太阳,你永远指示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3]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时是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学生陈小眉。如果从毛文体的塑造过程看,它的确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参与的结果,然而它的复杂性远远不能仅仅从塑造过程理解,更需要考虑的是超出具体的历史现场之后对现代汉语语言品质和汉语主体语言感受的深度影响。

(二) 意识形态文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学教育的繁荣是空前的,但是这种繁荣依附于意识形态文体。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审视现代汉语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从各种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叙述中选择某些与语言主体的感受有关的词汇考察现代汉语与中国社会的互动。甘阳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是认知这个年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用“反叛”和“彷徨”2个词凸现自己的编辑思路;孟繁华在描述这个年代的文学状况时使用了一个标题:“激情岁月的文学梦想”;许纪霖则指出,“在80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4]当然,这里列举的不是关于20世纪80年代叙事的全部,但其中贯穿着某种统一的修辞格式,它试图塑造一种思想姿态,澄明或者抽象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姿态。这种思想姿态决定着我们的语言趣味,我们迷恋于沉重的词语丛,而且总是希望在这些词语丛里发现世界的崇高。

(三) 轻与重的对峙及其开启全新语言空间的可能性

在20世纪90年代,王朔无疑是文学界的弄潮儿。我们迄今还不能完全估量王朔可能具有的文学史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王朔的出现,我们的语言趣味遭遇到自己的反讽形态,由此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趣味,它在本质上是轻松的、幽默的、嘲弄性的。不过,王朔无力把自己已经呈现出的语言趣味转变为成熟的文体,这需要由更天才也拥有更自觉意识的作家来完成。即便如此,王朔的出现依然直接向当代文学教育的尊严提出挑战。正是因此,中国文学界掀起了所谓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在整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对王朔的批判暗示了2种语言趣味、2种文体之间的对峙,隐含着开启全新的语言空间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始终停留在思想的玄学层面,拒绝进入语言空间。

三、回到语言本身的文学教育的可能性

(一) 对文学教育危机的自觉

不管我们能否拒绝、能否回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学教育的危机。例如陈平原就说道:“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只想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算合格的文学教育?近百年来中国人以‘文学史’(准确地说是文学通史)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这一选择,是否有重新调整的必要性?”^[5]而吴晓东的提问也许更尖锐:“什么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文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究竟应该给学生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我们究竟想让学生从我们的讲授中获得什么?”^[6]面对这些对文学教育本身以及教师职业意义的质疑,我们不能悬拟出一套解决办法,不能仅仅依靠某些技术性的设想去克服。因为文学教育的意义只能在限定的历史——现代汉语的历史和文学教育自身的历史中建立,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回到陈寅恪那里。

(二) 汉语史与陈寅恪语文学观念

在1932年的论争中,陈寅恪指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并提升个体的想象力和描写力。理解这个简单的表述不能完全拘囿于1932年的历史现场,我们应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陈寅恪为自己所选择的文化位置等多种因素构成的更复杂的背景中思考问题。

汉语的变革在近代中国首先不是一个语言史讨论的对象,而是攸关民族前途命运的政治事件。因为汉语变革确立的目标是要形成合适的社会动员工具,而毛文体恰好是这一目标可能期望的典范,甚至是最高成就。在近代意义的文学教育系统建设的过程中,汉语变革及其目标就始终以潜在的形态在整体上制约文学教育系统的运转,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制约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的走向。

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包括陈寅恪在内,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坚守文言书写的学问群体。1932年的争论固然由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命题形式引发,但其中也明显表达了对坚守文言书写方式的说明,这就是汉语语法系统的建设。汉语语法系统的建设对于陈寅恪来说,不仅是一种学术期望,同时是一种营建精神空间的努力。如他所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7]而这种精神空间必须最终落实到语言层面。

现在,我们自然不是要回到文言文,陈寅恪的语文学观念对于我们的意义仅仅是如何营造一种可以落实到语言层面的精神空间。

(三) 走出文学教育危机的方向

在对陈寅恪语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文体形成轨迹的追踪过程中,我们已经觉察出文学教育的另一可能。我们往往只是把语言理解为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但看到陈寅恪面对语言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态

度,看到意识形态文体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塑,我们应该克服面对语言时的傲慢,而文学教育的立足点也应该发生一个从文学回到语言的彻底转向。这个转向正是解决当下文学教育困境的有效方式,而这一方式的有效性需要从3个方面理解。

第一,文学教育回归到语言这个起点,实际上意味着它将担负起守护母语和语言的本源性意义的责任。守护母语和语言的本源性意义,当然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汉语;相反,全球化的蔓延已经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独自守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而这个精神空间只能是语言空间,它需要一群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守夜人。文学教育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职业技能教育,即使在当下,它恐怕能够选择的依旧是涵养守夜人的心性而已。

第二,文学教育回到语言这个起点,还意味着它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在反省的姿态里清除近代以来汉语变迁过程中已经造成的语言污染。从建设理想的社会动员工具开始,到意识形态文体的形成并全面影响中国人的精神结构,这个过程对汉语的污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汉语表达的平面化以及汉语描写力的弱化,也可以说汉语丧失了表达差异性的能力。而一种语言如果丧失了表达差异性的能力,它同时就必然丧失了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怀。

第三,文学教育回到语言这个起点,还意味着一种为文学和文学教育重新奠基的可能性。欧文·沃尔法思在概括本雅明的语言观念时指出,“堕落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堕落,是以上帝为灵感的命名语言的堕落,同时标志着‘人的语言的诞生’。由于语言从原初的是堕落为有,因此就与‘抽象’、‘判断’和‘含义’成为同义词,语言不再是一种介质,而是一种手段,用于主体间的‘交流’”^[8]。本雅明意义上

的语言堕落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文学和文学教育必须为回到命名语言保留一份希望。

四、结 语

本文选择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科入学考试命题的争论、意识形态文体的形成、王朔的出现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等具体历史场景梳理其中与当代文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内容。在梳理过程中,本文得出了文学教育危机深层的历史原因:在近代学校制度中,文学教育始终承担着沉重的意识形态使命;文学教育危机的表现是文学对语言的排斥;克服这一危机的出路只能让文学教育回到语言这个起点上。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书信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2]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C]//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 [3] 陈小眉.又是红枫时节:写在旅美教学十八年之后[C]//王斑,钟雪萍.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
- [4] 许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 [5]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 [6] 吴晓东.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教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26-28.
-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8] 欧文·沃尔法思.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世纪”[C]//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3-31.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related problems

WEI Xiao-hui

(School of Ethnic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utle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ducation, the paper narrates and analyzes certain events and phenomena during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ducation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anguage itself. It should protect the purity of our mother language and resume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by getting rid of the language detriment in the modern times.

Key words: literature education; modern Chinese; contemporary; language